



## 第一次犹太战争史料解析：约瑟夫斯与塔西佗

周 平\*

历史研究的部分意义在于发现历史真相，但确认什么是历史真相并不容易。本文尝试通过比较约瑟夫斯和塔西佗分别讲述的第一次犹太战争，从如何客观看待史料真实性的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约瑟夫斯与塔西佗关于第一次犹太战争历史的书写是仅存的第一手史料。文章分析解读了两位史学家对第一次犹太战争中三个重要问题的书写：（一）关于古代犹太历史；（二）关于战前罗马—犹太关系的危机及战争的起因；（三）关于提图斯在焚烧耶路撒冷圣殿事件中的立场。史料阅读可见，两人的书写有相同之处、有不同之处，有时甚至完全对立。本文从写作者的身份、立场、读者群及相关社会历史语境等多方面分析了史料。作者认为，比较研究的根本目的不在于发现谁在说谎，重要的是通过仔细研究，客观分析所谓的“谎言”，在历史语境中理解历史、理解历史学家，从而更加接近历史的真相。

特拉维夫大学著名历史学家泽维·亚维茨(Ziv Yavetz)教授在一篇塔西佗和约瑟夫斯比较研究的文章中这样说过：“如果塔西佗的《历史》第五卷是我们了解犹太人出埃及到第二圣殿被毁这段历史唯一的资料来源，犹太历史该是多么卑贱而不可理喻啊！”<sup>②</sup>这段话的潜台词很清楚：幸亏有约瑟夫斯，不然我们就可能对历史作出错误的判断。第一次犹太战争的亲历者约瑟夫斯的《犹太战史》为一部七卷长篇巨著。该书不仅描写了第一次犹太战争的全过程，也呈现了犹太民族战前两百多年的历史，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政治、历史及文化背景，是我们

\* 周平，上海大学教授、博导，英国雷丁大学古典学系博士，研究方向为古代犹太历史文化。

② Yavetz, "Reflections on Titus and Josephus," *GRBS*, 16(1975), p. 411. 另，本文所有英文文本内容的译文均为作者译自洛布文库中的塔西佗的《历史》（第4~5卷）和约瑟夫斯的《犹太战史》（第1~7卷）等，特此说明。

了解公元1世纪这一重要事件的主要资料来源。亚维茨教授继而指出,客观综合分析两位历史学家的著作,可以较为清晰地认识1世纪时期罗马帝国与被征服民族的关系。如果现存还有其他罗马以外被征服民族的历史文献,也许我们可以多了解一些细节,但整体画面不会有大的改变。由此可见,研究这段历史,两位历史学家的著作缺一不可。它们的珍贵之处在于彼此的差异性和互补性。然而,在罗马历史和犹太历史研究中,学术界对约瑟夫斯质疑和批评的声音从未停息过。多数批评指向作者的人品和政治立场,认为他是犹太民族的叛徒、罗马皇帝的吹鼓手。他的《犹太战史》不过是按罗马皇室的旨意,执行的一项政治“任务”(commissioned task)。持有此观点的人因此认为,这样状况下编撰的历史,必然充满“谎言”与“偏见”,不足为信。对于约瑟夫斯的批评来自于方方面面,其中一些批评的源头正是来自塔西佗的《历史》第5卷。塔西佗与约瑟夫斯是同时代的历史学家,尽管他关于这场战争的描述大部分已经佚失,但他关于战争前罗马总督执政的描写、战争中犹太派系之争等内容,与约瑟夫斯的相关描述有互证关系。关于两位同时代的作家是否知晓对方并参考了对方的资料这一点,仅根据双方的文本很难作出判定。尽管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但至今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他们参考了对方的资料。<sup>①</sup>除了个别相同之处,他们描述中的不同之处更加让人印象深刻。塔西佗是公认的相对客观的古代历史学家,他一生都在强调史学家必须保持中立与客观立场。所以,尽管他的相关叙述只剩下只言片句,也被许多研究者当做指责约瑟夫斯“说谎”的证据。其实所谓的谎言与真实都不是绝对的。以下的分析可以让我们对约瑟夫斯与塔西佗的“矛盾之处”有更加清楚的认识。本文将从三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关于犹太历史、战前罗马—犹太关系、战争起因,以及罗马皇帝提图斯在烧毁耶路撒冷圣殿事件中的作用与态度。

## 一、关于犹太历史与文化

遗憾的是,塔西佗的《历史》中有关这场战争的描述大部分已经遗失,仅存第5卷1~13段以及《残篇》中的1~3段,单词总数不超过2000,但他关于犹太古代历史文化这部分却被完整地保留下来。

和约瑟夫斯一样,在叙述战争本身之前,塔西佗用了不少笔墨介绍犹太民族的历史,内容包括犹太民族的起源、宗教习俗、朱迪亚地理形态以及该民族的近代历史等(5:2~10)。在他列举的5个犹太民族来源的传说中,按曼彻斯特大学

---

<sup>①</sup> 关于这个问题,我个人认为,塔西佗有关战争中犹太人内部纷争的内容很可能来自约瑟夫斯的《犹太战史》,鉴于这个问题不在本文讨论范围,本文没有展开讨论。



历史学家布鲁斯教授(Bruce)的说法,“他选取了最不可信的一种”<sup>①</sup>。照他说,犹太人最初在克里特岛生活,朱庇特推翻萨图恩后,犹太人被驱逐出境,作为难民定居在利比亚。其依据是“Idaei”一词是源于克里特一座山峰的名字“Ida”(5:2)。其他几种说法包括犹太人是埃及难民,因为一场灾难患上麻风病,埃及国王按神谕指示,将其驱逐出境,弃于荒野之中自生自灭。之后犹太人在一名叫摩西的人带领下,占领迦南,修建圣殿等等。关于犹太人的宗教习俗,塔西佗的说法包括约瑟夫斯在《驳阿皮翁》中用大量笔墨驳斥的“驴崇拜”、设立安息日“是因为懒惰”等传说。他的描述中还有许多自相矛盾的地方。比如他一方面指出犹太教为一神教,不在圣殿供奉任何有形的神像,另一方面又说,犹太人在圣殿供奉着“驴头”(5:4)。

塔西佗关于犹太民族的起源与宗教习俗的描述与评论本身不是重点,值得思考的是,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为什么会引用这些看起来荒唐可笑的资料。按布鲁斯教授的说法,这是因为这些传说符合塔西佗本人对犹太人的看法。也可以看出,塔西佗个人对犹太文化并不感兴趣,抑或他认为希腊作家的描述更为客观。<sup>②</sup>

我基本同意布鲁斯教授的观点。但我想指出,并不是塔西佗“个人”对于犹太历史文化的看法与众不同,而是他的观点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罗马帝国对犹太人的普遍看法与态度,反映了当时外界对犹太民族的无知和偏见。<sup>③</sup> 在《历史》出版的2世纪初,罗马—犹太战争早已结束,犹太人最终以失败而告终,遭到了几乎种族灭绝的灾难。幸存者流散各地,受到屈辱的待遇(如战后“犹太税”征收政策的颁布)。当时的罗马世界对犹太民族的歧视在塔西佗第5卷的评论措辞中得到了清楚体现。他在描述中反复使用了一些带有强烈贬义的词汇和语言。对于摩西制定的新的犹太宗教律法和习俗,塔西佗评论说,这个宗教“与之前的所有宗教都背道而驰。我们认为神圣的,犹太人统统视为异端;相反,我们所憎恶的,他们通通接受”(5:4)。在评论犹太人的民族习俗时,塔西佗反复使用“(最)卑贱”(base, basest, meanest)、“恶心”(abominable)、“堕落”(depravity)等形容词,并将他们的宗教定义为“迷信”(superstition)、“野蛮”(primitive、barbarian)等。他斥责皈依犹太教的其他民族的居民为“败类”(worst rascals),将流散的犹太人向耶路撒冷圣殿进贡的行为解释为出于犹太人贪婪、聚财的本性。对于犹太人对同胞和与其他民族的关系,塔西佗说:“他们对彼此极为忠诚,

① Bruce, “Tacitus on Jewish History,” *JSS*, xxix/1, Spring 1984, p. 33.

② Bruce, “Tacitus on Jewish History,” *JSS*, xxix/1, Spring 1984, pp. 35-37.

③ 约瑟夫斯的《驳阿皮翁》中收录并驳斥了大量当时流传的罗马世界对犹太人习俗的传说。

#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6辑

随时准备相互施与同情,但对其他民族则只有仇恨和敌意。”关于犹太人对皈依者的教育,塔西佗说,他们的第一堂课就是教会他们“蔑视神祇,背叛祖国,抛弃父母、子女或兄弟”。其他言论包括犹太人不允许与外族女子发生关系,自己内部却无所不为等论调(5:1~8)。这些措辞极端、价值判断绝对的言论在之后的2000多年里,在世界对犹太人的普遍认知方面影响很大。

有了这样的成见,罗马作家对于犹太文化不感兴趣,或不信任(或者说蔑视)犹太作家完全在情理之中。的确,关于犹太历史,如果他稍加用心(或有心),就可以发现,希腊文圣经(Septuagint)100多年前已经在埃及亚历山大利里亚出版,其中就包括圣经的历史书卷。此外,1世纪著名的犹太哲学家斐洛(Philo)也将犹太历史作为他阐释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当然,与塔西佗最近、话题最具相关性的则是与他几乎同时期、同在罗马写作的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

约瑟夫斯在《犹太战史》《犹太古史》及之后的《驳阿皮翁》中(发表时间都早于塔西佗的《历史》),对犹太民族的古代历史和文化习俗做了较为详细的叙述。在约瑟夫斯的《驳阿皮翁》中,作者还对当时流传的有关犹太历史的一些不实的、恶意的传说一一进行驳斥,其中就包含塔西佗引用的“麻风病瘟疫”“驴崇拜”“仇恨其他民族”等若干内容。<sup>①</sup>对于约瑟夫斯著作的读者身份,本人曾在《〈犹太古史〉所罗门传》一书中有过较详细的分析。尽管约瑟夫斯在各种场合表示,他所期待的读者是希腊—罗马人,早期的约瑟夫斯研究也是建立在认可这一点的基础之上的;但到20世纪50年代,契里科夫(V. Tcherikover)基于历史发展的轨迹和相关史料揭示,约瑟夫斯的读者不太可能是希腊—罗马人,而是犹太人自己。<sup>②</sup>这个结论当时引起学术界一片哗然。此后至今,学者对这个问题仍然存在争论,但大部分学者已经接受“双重读者理论”。我在之前的著作中,也分析了约瑟夫斯的读者,提出他的希腊—罗马读者只是他的“理想读者”,而他的“事实读者”甚至基本不包括也在他期待中的犹太读者。真正进入我们视野有据可查的读者群乃是基督教徒。<sup>③</sup>基本可以确定,希腊罗马的精英们对犹太文化并不感兴趣。但这种状况也有例外,尽管没有说明资料来源,塔西佗在《历史》中有一段关于犹太人在战争中内讧的描述,却极有可能来自约瑟夫斯,因为罗马人对犹太人的内部情况并不清楚,而约瑟夫斯在这方面花了大量的笔墨,做了十分详细的描述。

<sup>①</sup> 关于约瑟夫斯反驳过的相关论述和作者,参见《驳阿皮翁》1:116-126。

<sup>②</sup> Victor Tcherikover, "Jewish Apologetic Literature Reconsidered," *EOS*, 48, pp. 169-193.

<sup>③</sup> 参见周平:《〈犹太古史〉所罗门传:希伯来传统与希腊化双重视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85~187页。



对于犹太民族早期历史的态度,两位历史学家的立场都很明确。由于塔西佗所引用的资料大多属于“神话与传说”,他对这些资料的真实性并不确定,也没有兴趣去确认,他的叙述也不屑于说明资料的来源。严格地说,塔西佗并不真正关心犹太古代历史,他更多的是在表达一种立场和观点。在约瑟夫斯的《驳阿皮翁》中,我们发现了塔西佗引用的部分资料的出处几乎百分之百出于非犹太人关于犹太人的传说。当然,约瑟夫斯在《驳阿皮翁》中也引用了大量对犹太民族有利的传言,以此证实犹太历史的辉煌与正义,其中也不乏荒诞与自相矛盾的地方。约瑟夫斯在《犹太战史》中讲述的是犹太近现代约 250 年的历史,始于安条克四世(Antiochus Epiphanes)时期,终于耶路撒冷圣殿被毁(公元 70 年)。尽管约瑟夫斯在这部著作中没有详细讲述犹太古代历史,但他接下来花费了 20 年时间撰写了长达 20 卷的《犹太古史》,完成了毕生的心愿。<sup>①</sup> 就犹太历史而言,约瑟夫斯的讲述更为详细而真实。但塔西佗的讲述同样反映了一个重要的历史现实,即 1 世纪时期,尤其是罗马—犹太战争之后,犹太民族在罗马世界的社会地位相对低下,外界对犹太人充满偏见与无知,犹太文学在罗马世界的接受与影响极其低微。

## 二、关于战前罗马—犹太关系危机及战争起因

塔西佗在第 5 卷后半部分讲述犹太人近代历史时表现得更为客观。由于这段历史在希腊—罗马作家作品中有现成资料,作者的写作也回归了历史学家惯有的客观现实的风格。当然,所谓的“客观现实”无疑也是在罗马的、帝国的视角下。而代表了犹太精英阶层政治与经济利益的约瑟夫斯,政治上亲罗马,在民族情感与文化认同上与犹太大众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但他的立场与犹太普通民众比较又有很大差异。出于各自的立场与情感,两位史学家对与罗马—犹太的战前关系有不同的理解与阐释也在情理之中。综合分析比较两位史学家关于犹太近现代史的描述,可以较为客观地认识战前的罗马—犹太关系,让我们能更接近战争起因的真相。

塔西佗关于庞贝入侵之前的犹太历史极为简短而笼统(5:8),时间表述不明确,事件也有些混乱,相关内容译录如下:

东方在亚述人、米甸人和波斯人统治时期,犹太人被看作他们最低劣的(meanest)臣民。马其顿人成为霸主后,安条克国王致力于根除犹太迷信,

<sup>①</sup> 参见周平《〈犹太古史〉所罗门传:希伯来传统与希腊化双重视野》第六章相关论述。

#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6辑

引入希腊文明,但与帕提亚人的战争使他改造(improving)这个最卑贱的(basest)民族的计划成为泡影,因为就在此其间发生了阿萨西斯(Arsaces)起义。再后来,马其顿势力日渐衰落,帕提亚人还不够强大,而罗马人又鞭长莫及,犹太人遂推选出了他们自己的国王。这些国王一个接一个被喜怒无常的暴民们推翻,他们(犹太人——译者注)又借助武装力量夺回王位。他们铲除百姓、毁灭城镇、弑兄杀妻、残害父母,无恶不作,毫不手软。他们还在民众中培育民族迷信,通过篡夺祭司身份来以支撑他们在国民中的威信。

塔西佗在这里叙述的是犹太哈西蒙王朝的历史。这段叙述得扑朔迷离的文字需要我们耐心地解读方能理出头绪。塔西佗在其中一些人物与事件的时间概念上有明显错误。尽管如此,对于这个奇迹般出现的犹太王国崛起的原因,塔西佗解释得很清楚,也符合历史事实。他关于安条克国王“致力于”改造这个“最卑贱”的民族的观念很重要。这最终将成为他阐释罗马攻打犹太人的重要理据。关于犹太政权与犹太民众,塔西佗的描述包含明显的道德裁判。其结论可以总结为几点:(1)犹太民族历来弱小卑贱,为其他民族所不齿;(2)在各国势力的夹缝中诞生的哈西蒙王朝毫无正义可言;(3)犹太民众多为“喜怒无常”的“暴民”。关于这段历史的描述,塔西佗在事件上没有虚构,在情感和道德判断上与他之前对犹太古代历史的立场与态度基本一致。

接下来塔西佗说,“第一个征服犹太人的罗马人”庞贝进入耶路撒冷圣殿,将耶路撒冷城墙夷为平地,但保留了圣殿。希律王死后,短暂复辟的哈西蒙王朝国王西蒙被叙利亚总督昆提利乌斯(Quintilius)处死,犹太人造反被镇压。之后,塔西佗提到罗马皇帝盖乌斯(Galigula, Gaius)时期的一个重要事件。他说:“盖乌斯命令犹太人将他的塑像放进圣殿供奉,他们(犹太人)则选择拿起武器抗命。”而这次起义因为盖乌斯突然死亡而终止。尽管双边关系没有彻底决裂,但导致罗马—犹太关系的重要危机之一——宗教冲突,已经浮出水面。对于导致危机升级的另一原因,塔西佗与约瑟夫斯的阐释基本一致,即罗马地方财政长官和地方总督的道德沦丧和管理不力。关于这一点,塔西佗提到了罗马总督安东尼乌斯·菲利斯(Antonius Felix)的“无恶不作”。他说,犹太人“一直忍耐”到弗洛鲁(Florus)做地方财政官时,双方才爆发了战争。而派去镇压犹太人的加卢斯(Gallus)则治理无能,屡战屡败,最终,尼禄皇帝派出了维斯巴芑(Vespasian)的“胜利之师”,总算赢得了胜利,“占领了整个平原地带以及除耶路撒冷以外的所有城市”。由于罗马内战的关系,犹太人接下来一年中平安无事。当意大利境内太平后,塔西佗说,“外部骚乱再起”,而且“只有犹太人不愿臣服,这让我们更加愤怒”。至此,塔西佗解释的三点战争起因已表述得很清楚:宗教冲突、罗马地



方官管理不力以及犹太人不服管教(5:9)。至少其中两点的责任在于犹太人自身。

关于战前罗马—犹太关系,约瑟夫斯的描述更为详细。这段历史他在《犹太战史》和《犹太古史》中都有记载,《自传》也涉及部分内容。我们知道,约瑟夫斯的政治立场与民族情感很复杂,而他对罗马—犹太关系的阐释也很微妙。约瑟夫斯笔下的罗马地方总督有好有坏。但他总结道,从1世纪初到战争爆发的60多年间,即使勉强过得去的总督也屈指可数。与一些极端民族主义者不一样,约瑟夫斯(及其他所代表的犹太上层)亲罗马政府,完全接受地方总督制度,但地方总督有几种行为他不能接受:(1)蔑视犹太人的宗教情感;(2)破坏犹太上层的内部管理;(3)无力控制犹太匪徒和宗教极端分子。在约瑟夫斯眼里,好总督有以下特点:(1)治理有方,能牢牢控制住各种犹太内部的不满分子,即土匪、暴力的宗教极端分子;(2)绝不会干涉圣殿和祭祀等宗教事务,并确保手下人,或与犹太人亦邻亦敌的本地叙利亚—希腊人不会冒犯犹太宗教;(3)更重要的是,这些总督信任地方权贵和大祭司,不与他们发生冲突。<sup>①</sup>

按照这个标准,约瑟夫斯对朱迪亚省总督菲利斯评述与塔西佗稍有不同。约瑟夫斯先以赞赏的语气描述菲利斯上任后剿匪,活捉匪首以利撒的功绩,但又不满这个事件中“无数”普通百姓被株连(B2:253)。在约瑟夫斯笔下,菲利斯是位铁腕官员,对诸如自称得到上帝神谕、宣传“革命变动”(revolutionary changes)的“假先知”(imposters)进行了无情的镇压(260、263)。<sup>②</sup> 根据约瑟夫斯对造反者一贯的批评态度可以判断,他对菲利斯的这种行为是赞赏的。在这一点上他的罗马立场暴露无遗。但当菲利斯在凯撒利亚城的希腊人与犹太人的争端中诛杀大批犹太人,抢劫他们的财产,最终还没能有效制止双方争斗时,约瑟夫斯对菲利斯表示了强烈愤慨(270)。菲利斯在这个事件中,破坏了约瑟夫斯两个好总督的原则,即不帮助本地希腊人冒犯犹太宗教,以及治理地方有方。

对另一位罗马总督阿尔比努斯(Albinus),约瑟夫斯则用了“无恶不作”(there was no form of villainy which he omitted to practice)来形容:“盗窃”“抢劫”“对百姓实施苛捐杂税”“收受贿赂”(如之前关押的恶棍匪徒只要付钱统统放出)等(273)。他说,这些人用金钱买通阿尔比努斯,使其对他们的造反行为置之不理,致使整个地区土匪猖獗(274)。此处又涉及对约瑟夫斯所憎恶的“土匪”或“革命者”打击不力、治理无方问题。但是,约瑟夫斯又说,和他的继任弗洛鲁相比,阿尔比努斯简直就是一个圣人!可见他对这位塔西佗也谴责过的总督弗洛

<sup>①</sup> Tessa Rajak, *Josephus: The Historian and His Society*, London, 2002, p. 65.

<sup>②</sup> 应该与1世纪时期的基督教传教活动相关。

#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6辑

鲁多么愤怒。他说,阿尔比努斯干坏事还得偷偷摸摸,而弗洛鲁则大张旗鼓,坏事做尽,“耶路撒冷城的反叛团伙无法无天的行为因此被激发”。约瑟夫斯对这个“坏总督”的控诉并没有到此为止。他指责弗洛鲁的所作所为是在有意激发暴动(277、280),他对犹太人最大的伤害是以帝国之名,掠夺圣殿财产,激起犹太人众怒(294~296)。更有甚者,事后弗洛鲁还无视犹太宗教领袖的斡旋,对无辜百姓大开杀戒(301~305),使犹太上层失去了民众的信任。这显然触犯到约瑟夫斯对罗马总督所有差评的底线。他认为,这个事件最严重的后果不仅使罗马—犹太的关系进一步恶化,而且使忠于罗马政府的犹太精英阶层也失去了对犹太民众的控制力。约瑟夫斯在《犹太古史》的结尾处说,弗洛鲁迫使犹太人与罗马人宣战。这是约瑟夫斯关于这个话题的最后一句话,也是最具总结意义的一句话。著名犹太—罗马史研究专家、牛津大学犹太研究中心副主任瑞洁克教授(Rajak)对此这样评论说:“因为犹太与罗马人之间的协作关系是约瑟夫斯学习管理的基本框架,现在这个框架已经崩塌,其被破坏的程度让约瑟夫斯目瞪口呆。”<sup>①</sup>

对于派来镇压犹太暴民的罗马叙利亚总督加卢斯,约瑟夫斯和塔西佗的评价出奇一致:无能。约瑟夫斯对这个事件的叙述极富戏剧性。耶路撒冷发生内乱,叛乱者包围了罗马军营,犹太人在应诺不杀罗马人的情况下,将除指挥官之外的所有罗马官兵全部处死,仅允许指挥官以行割礼代替死亡。与此同时,其他城市的希腊人则扑向犹太人,一时间,整个地区充满血腥的杀戮。罗马人派加卢斯带领十二军团和其他地区调集的军队前来镇压。本是一次胜券在手的军事行为——约瑟夫斯所期待的有力的治理行为,却因为一次莫名其妙的撤退而导致了行动失败,加卢斯自此离开了朱迪亚。约瑟夫斯批评说:“如果他再坚持围攻一阵,可能很快就会拿下这座城池。”(B2:539)两位史学家对加卢斯的无能一致谴责,认为这是导致犹太反叛者行动升级的直接导火线。

他们指出的关于战争爆发的另一原因也不可忽视,即希腊化对犹太宗教和社会带来的冲击和分化。在这一点上,约瑟夫斯和塔西佗的立场有着本质的区别。在塔西佗看来,菲利斯在凯撒利亚城的“希腊化”是在引入希腊文明,是罗马“改造”犹太“卑劣”的宗教习俗的必要之举;而约瑟夫斯则认为,犹太宗教文化历史悠久、高度文明,并且具有崇高的道德标准。立场与认知上的差异,导致了他们对事件的不同阐释。对于约瑟夫斯来说,引发这场战争最罪不可赦的是犹太人内部的分裂与冲突。比起“坏总督”来,约瑟夫斯更为严厉指责的是狂热的宗

<sup>①</sup> Tessa Rajak, *Josephus: The Historian and His Society*, London, 2002, p. 67.



教极端分子和叛乱支持者,认为他们应该对战争爆发负主要责任。按约瑟夫斯的观点,正是这种内部的大分化、大瓦解弱化了犹太民族的凝聚力,迫使罗马军队不得不强力干涉。事实上,对于犹太叛军的厌恶与批评贯穿约瑟夫斯的整个《犹太战史》。<sup>①</sup>他在《犹太战史》中对战争初期的一个敏感事件做了详细记载。据他记载,66年,一群宗教狂热分子占领了耶路撒冷圣殿,其头目以利撒(Eleazar)力劝圣殿祭司废除代外国人献祭的事务。为此,约瑟夫斯评论说:“这个行为打下了和罗马人开战的基础,因为代罗马人及其皇帝献祭之事也从此被取缔。”富有的亲罗马犹太人试图阻止叛乱,反对这一改变,并请出宗教专家解释代外国人献祭是犹太人的祖先所定下的由来已久的传统(B2:409~420)。通过塔西佗的《历史》,我们也可以看到对于这件事罗马方面的反应。在谈到犹太人信奉的一神教时,塔西佗评论说:“对他们来说,至高无上的神是永恒的、不可表现的。因此,他们的城市里没有任何塑像,更不用说他们的圣殿里了。他们的国王不能享受这种敬意,罗马皇帝也不能(5:5)。”此处塔西佗讲的并不是事实。代罗马皇帝祭祀的仪式实际上是到战争初期才停止的。可见罗马人对此也颇为敏感。

瑞浩克教授分析了约瑟夫斯在战争起因问题上的立场,认为他的分析客观现实,但也指出约瑟夫斯作为犹太精英阶层的局限性:由于他的阶级立场,他更愿意公开抨击罗马总督的失误,而不愿指责犹太上层阶级内部的错误。<sup>②</sup>就这个问题看,约瑟夫斯的立场不仅属于两个阵营,而且属于“多个阵营”。<sup>③</sup>

塔西佗的叙述视角比较单一,缺少细节,结论也比较粗线条。他对犹太内部的矛盾并不清楚,对叛乱者的指责也出于不同的立场。他并没有区分犹太人内部的高低贵贱,而是对整个犹太民族表达了蔑视态度,认为他们种族低劣,不愿配合罗马政府的希腊化的“文明改造”政策。罗马方面对造反者采取强硬政策理所应当。与约瑟夫斯评论上的相同之处也引人注目,即对地方总督滥用职权、草菅人命、管理无能等的指责。这对当时罗马地方总督制度本身提出了批评。的确,当时罗马以外的帝国占领区,地方总督掌管所有执法大权。除皇帝以外,任何人无权过问。

---

① 约瑟夫斯对马萨达守城者的身份与评价问题比较复杂,不在这里展开讨论。感兴趣者请查阅《犹太战史》第7卷。

② Tessa Rajak, *Josephus: The Historian and His Society*, London, 2002, p. 63.

③ Tessa Rajak, *Josephus: The Historian and His Society*, London, 2002, p. 222.

### 三、关于提图斯与圣殿毁灭的关系

评论者认为,约瑟夫斯在《犹太战史》中最大的“谎言”,也是指认他是罗马政府的傀儡史学家的证据,莫过于他关于罗马将军,也是之后的罗马皇帝提图斯在烧毁耶路撒冷圣殿事件中的作用与态度的描写。如果说他在其他方面的描述与塔西佗的描述有出入,那么在这个事件上,他与塔西佗的描述在关键的地方——提图斯是否主张烧毁圣殿的立场上——则完全相反。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塔西佗的描述”本身并不完全准确。事实上,塔西佗关于圣殿被烧毁这部分内容包含在《历史》第5卷所佚失的部分。目前洛布文库中的相关文本,即附在《历史》第5卷后的《残篇》部分(Fragments of the Histories),来自于4世纪基督教史学家苏庇修斯·塞维鲁斯(Sulpicius Severus)的拉丁文《编年史》。近代学者伯奈斯(Jacob Bernays)认为,塞维鲁斯和5世纪的一位历史学家奥罗修斯(Orosius)分别用了塔西佗《历史》中如今已经失传的关于耶路撒冷沦陷的资料。这也是洛布文库将这部分残篇收录在塔西佗的《历史》中的依据。这段话文字不多,译录如下:

据说提图斯之前召集军事委员会成员会议,斟酌他是否应该烧毁这样一座雄伟的庙宇。有人认为,不应毁掉这样一座人力能建造出的最了不起的圣殿。他们争辩说,留着它可以见证罗马人的仁慈,而毁灭它则将永远背负残忍的恶名。包括提图斯在内的另一些人则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要铲除犹太教和基督教,毁掉圣殿绝对必要。尽管犹太教与基督教相互仇视,但他们同根同源,因为基督教发源于犹太教。如果根基被铲除,其枝干也必将不存。<sup>①</sup>

无论这一段有明显基督教痕迹的文字是否真正出自塔西佗,但其观点的确符合1世纪时期罗马人对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看法。相比之下,约瑟夫斯对这个事件的描述可谓煞费苦心。显然,提图斯在这个事件上的立场对他至关重要。他在《犹太战史》的前言中就明确指出,是犹太人自己逼得罗马人不得不烧掉圣殿,尽管提图斯本人并不情愿这样做(B1:10)。谈到提图斯的态度时,约瑟夫斯说,提图斯“急于要保住这座城市和圣殿”,而烧毁圣殿“有悖于提图斯的意愿”(27,28)。在《犹太战史》第6卷里,约瑟夫斯花费大量笔墨,用相当夸张的语言

<sup>①</sup> 尽管伯奈斯删除了许多明显是基督教口吻的东西,但这段文字看起来还是与塔西佗的语气有距离。伯奈斯的研究认为,塞维鲁斯与之后的奥罗修斯的资料来源相同(都是来自塔西佗),内容基本一致,而且塔西佗的《历史》在5世纪还完好存在,所以这段话的内容应该可信。



表现提图斯保住圣殿的决心,说他甚至在犹太人自己玷污了圣殿的情况下仍然没有改变初衷(B6:124~128)。约瑟夫斯告诉我们,提图斯的好意由他(约瑟夫斯)转告了犹太人,但“匪徒”(Brigands)及其“暴君”(tyrant)<sup>①</sup>却把将军的好意(goodwill)当成怯懦而不予理睬(B6.129)。在之后的长篇叙事中,约瑟夫斯用了若干细节渲染提图斯的仁慈和耐心,并将其的仁慈与犹太叛军的顽固不化作对比。但事实上,在他描述军事会议之前,读者已经完全明白提图斯对焚烧圣殿的态度。尽管约瑟夫斯并没有直接下结论,但他的观点已经阐明:真正要对圣殿被毁负责的是犹太叛军自己。鉴于约瑟夫斯的历史是事后视角(hindsight),其时圣殿被毁已成事实,而且圣殿毁灭者确实是罗马人,所以他接下来有关军事会议的叙述对确认提图斯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就更加意义重大:既然提图斯并不主张毁掉圣殿,那么罪魁祸首到底是谁?有关这次军事会议的文字十分微妙有趣,译录如下:

他召集六位首领开会……讨论圣殿事宜。一些人认为必须实行战争法则,如果圣殿继续作为四面八方(的犹太人)的集聚地,犹太反叛将永无止境。另一些人说,如果犹太人放弃圣殿,不在殿中存放任何武器,那圣殿应该保留;如若他们占据圣殿为作战据点,应该把它烧掉。因为圣殿不再是圣殿,而成为堡垒。那样的话,圣殿亵渎者就不是罗马人,而是那些逼迫他们烧毁它的人。但提图斯则宣称,即使犹太人把圣殿作为堡垒,他也不愿把仇恨发泄到人以外的圣殿物件上,也无论如何不会烧毁这个宏伟的建筑;因为这将是罗马人的损失,如果圣殿仍然屹立,它将增添帝国的辉煌。他的论点使……(与会者——译者)印象深刻,同意了他的观点。他随后宣布散会,命令军官们允许其他士兵稍作休息,他要看到他们在战斗中焕发精神。他从军团中挑选精兵,命令他们从废墟中开路、灭火(B6:239-243)。

两段文字的共同之处在于对事件本身的描述:(1)罗马人对于是否烧毁圣殿态度慎重,召开高级军事会议专题讨论。(2)对圣殿建筑的宏伟印象深刻。(3)对于这个问题在与会者中有争议。但有关会议争论的具体描述和最终决定却大相径庭。塔西佗文本中提到的“包括提图斯在内的另一些人”坚持必须烧毁圣殿,理由是耶路撒冷圣殿是犹太宗教的象征,是犹太人的精神支柱,必须要毁掉。此外,犹太教与基督教有血缘关系,铲除犹太教的根基,有利于消灭基督教。就一个军事会议来说,这两点理由具有很强的政治意义与战略意义:(1)烧毁圣殿象征此次战争的敌人被彻底消灭,战争胜利结束;(2)对罗马帝国的稳定具有

<sup>①</sup> 这是约瑟夫斯常用来称呼犹太反叛者的用语。

前瞻性意义。对于提图斯的个人形象来说,尽管塔西佗对弗拉维王朝并不“感冒”,也曾多次批评弗拉维王朝的史官惯于阿谀奉承,以至于不屑于撰写该王朝历史(《历史》2:201),但他对提图斯的军事才能和勇气却始终如一地表示赞赏。就我看来,此处描写提图斯赞同烧毁圣殿绝非贬义,而是一名有勇有谋的军事家的正确决定与果敢行为。我们不能忘记,作为军事将领和之后的罗马皇帝,提图斯最主要的功绩就是犹太战争的胜利,这一点被永久体现在至今屹立的提图斯凯旋门上(Titus' Arch)。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撒谎的人是约瑟夫斯吗?

根据约瑟夫斯的记载,军事会议上提图斯坚决反对烧毁圣殿。支持烧毁圣殿的人认为,圣殿是各地流散的犹太人的集聚地,而人群集聚与再次叛乱具有关联性。这是一个符合逻辑的军事和政治判断。但提图斯却最终说服所有参会者放弃烧毁圣殿的主张。我们都知道,这个决定和之后的结果完全相反,圣殿终究还是被罗马人烧毁了。约瑟夫斯在军事会议结束和圣殿被烧毁之间有大量的细节描写,凸显这件事反转的过程。最重要的桥段是,一个士兵在没有得到命令的情况下,“鬼使神差”(moved by some supernatural impulse)地抓起一段燃烧的树枝,将火把投入门里,点燃了致命的一把火(B6:252)。认为约瑟夫斯并没有撒谎的瑞洁克教授说:“这段文字充满了详尽的细节,十分令人信服。唯一令人怀疑的就是作者坚持表现提图斯的好意有些过头……看来作者固执得过分了。”<sup>①</sup>

但单纯判断约瑟夫斯是否说谎似乎是一个永远无法解决的难题。从时间和空间判断,约瑟夫斯肯定比其他任何史学家都更接近真相。尽管他不可能旁听军事会议,但他自始至终都在提图斯身边。除了查阅提图斯的军事记录之外,他还有可能与提图斯有直接交流(作为贴身翻译),能从提图斯的谈话中判断他的立场与决定,所以瑞洁克认为他的记载真实可信。就约瑟夫斯对圣殿的情感和他对提图斯的一贯评价而言,这个描写与之前的态度并无矛盾。对于约瑟夫斯来说,提图斯不仅仅是一个军事家、政治家,也是一个德才兼备的伟人,是他崇敬的恩主。尽管约瑟夫斯对罗马军队残酷的一面在《犹太战史》中多有表现,但他多处强调提图斯个人品质中仁慈善良的一面,并且常常通过犹太反叛者的残酷来反衬提图斯的仁慈与善良。按瑞洁克的说法,“约瑟夫斯把帝王最大的美德赋予了提图斯”<sup>②</sup>。约瑟夫斯对提图斯的描写集中表现了他对弗拉维王室的个人情感,而无疑这些情感都是真实的。问题在于,约瑟夫斯对于提图斯的描写是否“过于一致”,以至于他把自己的伦理观也强加于提图斯的身上呢?尤其是在圣

<sup>①</sup> Tessa Rajak, *Josephus: The Historian and His Society*, London, 2002, p. 207.

<sup>②</sup> Tessa Rajak, *Josephus: The Historian and His Society*, London, 2002, p. 213.



殿这个问题上。在这一点上,他的描写完全是出于犹太视角,把犹太人的宗教观和道德观强加于提图斯身上。

烧圣殿对约瑟夫斯这样一个有坚定宗教信仰和民族自豪感的犹太人来说是千古大罪,此创伤他一生都没有愈合。与之后的各种犹太拉比文献一样,他的历史著作必须要对这个事件作出道德评判。与拉比文学和犹太民间记忆不同的是,约瑟夫斯的立场要复杂得多。在拉比文学和犹太民间记忆中,提图斯永远是邪恶的圣殿毁灭者形象。而约瑟夫斯对于这个问题的阐释则充分表现了他的多重立场。一个仅仅局限于犹太视角,或者仅限于罗马视角的史学家都不可能以这种方式描写这个事件。对于罗马人来说,是否烧毁圣殿是个重要的军事和政治问题,对约瑟夫斯来说,一方面是融化于血液中的民族情感与宗教道德问题,是犹太民族生存与灭亡的重大历史问题;另一方面是对罗马人行为的道德评判问题。这样一来,谁是烧毁圣殿的真正罪人这件事就不那么简单了。

他的观点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点:其一,虽然是罗马人烧毁了圣殿,但直接责任不在提图斯。其二,有迹象表明,“上帝”在这个事件中站到罗马人一边。约瑟夫斯这个观点符合整个犹太传统中的上帝创造历史的观念。在《圣经》中我们看到,犹太民族的历史就是一个罪与罚加拯救的轮回过程。在约瑟夫斯心中,犹太宗教思想和传统的历史观早已打下不可磨灭的烙印,对这个事件的阐释也不例外。<sup>①</sup> 不同的是,《希伯来圣经》虽然也常常表现上帝会借敌人之手,惩罚犹太人的罪过,但敌人只是上帝裁判的工具,不等同于上帝认可敌人的行为正义或道德。而且这些打击过犹太民族的敌人,早晚会为他们的行为付出代价。这是犹太历史观中典型的“神宠论”的表现形式。但他此处描写的罗马人显然是道德与正义的化身,照此观点,上帝的宠爱已经不再局限于犹太人,而是以正义与道德为标准。这是约瑟夫斯历史著作中,将上帝的神宠观道德化、哲学化和世界化的最重要的创新观点。<sup>②</sup> 在他的描写下,那个士兵投火把的事件被描写成一个“事故”,而且被蒙上一层超自然的神秘色彩。约瑟夫斯的新神宠论在其他地方早有阐释。在《犹太战史》中,他曾借朱迪亚的国王阿格里帕二世之口,劝告犹太民众不要抵抗罗马人。在陈述罗马在整个世界的力量强大到无人能及的现实之后,他说:“你们仅存的理由是你们的行动将会得到上帝的支持。但连上帝也站在罗

<sup>①</sup> 关于这个问题,可参见近期 William den Hollander 在一篇题为“Jesus, Josephus, and the Fall of Jerusalem: On Doing History with Scripture”[*HTS Theologies Studies*, 71(1), 2015]的文章中对约瑟夫斯与圣经耶稣的历史观比较研究。

<sup>②</sup> 关于这个问题的深入讨论,参见周平:《〈犹太古史〉所罗门传:希伯来传统与希腊化双重视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82 页。

#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6辑

马人一边,不然他们如何能够建造如此广阔的帝国?”(B2:391)其三,叛军的挑衅行为导致事态失控。根据约瑟夫斯的描述,在军事会议之后,罗马人开始执行提图斯的命令灭火。但犹太人再次对罗马人发起攻击,因此激怒了罗马士兵。而提图斯本人在整个事件中,不仅表现出对犹太人的容忍和耐心,还表现出对犹太宗教和圣殿的极大尊重。但由于犹太叛军拒不投降(比较塔西佗在叙述军事会议之前的双边形式:“犹太人被紧密包围,不给任何机会议和或者投降……”《残篇》1),不得不下令最后进攻圣殿。在整个事件中,提图斯的态度是明朗的,他不是圣殿的毁灭者,而是保护者。

约瑟夫斯对圣殿被毁整个事件的描写完全符合他在整个《犹太战史》中阐释的政治立场和历史观。瑞浩克在她的《史学家约瑟夫斯及其世界》中有一段很精彩的点评:“约瑟夫斯最令人震惊、也相当大胆的地方,正是他用犹太人特有的理论来解释完全希腊化的政治史。”(79)的确如此,尽管约瑟夫斯意在宣称他的历史著作是修昔底德式的政治史,语言和文学形式也还是希腊化的,但他的历史观却是地地道道的犹太人的历史观,即历史代表的是上帝对世界的旨意和对所有民族的安排,其中心是罪与罚的关系。如果真如他所说,提图斯和他关系密切,提图斯就有可能了解他的立场和思想。那有没有可能是提图斯本人对他解释,他的本意是要保护圣殿的呢?如果是这样,也许他没有完全说谎。无论怎样,可以肯定的是,约瑟夫斯的确不愿意把提图斯和毁掉圣殿的千古罪名联系在一起。他的描述至少可以让我们再次确定他的写作立场和历史观。

而作为一个史学家,塔西佗的历史观更多的是基于英雄创造历史的希腊古典思想和政治。他不会认为有必要在圣殿毁灭这件事情上做任何宗教伦理评判。犹太战争的胜利是罗马帝国的胜利,其中也包括占领和毁灭耶路撒冷圣殿。作为指挥者的提图斯下令烧毁圣殿在情理之中。在他看来,这与宗教意义上的邪恶没有任何关系。所以也没有必要认为塔西佗故意在这个问题上和约瑟夫斯唱反调,以此反证约瑟夫斯在撒谎。我认为基督教史学家苏庇修斯·塞维鲁斯如实转述塔西佗的描述的可信度也很大,因为基督教在圣殿被毁的立场上与拉比犹太教完全一致,认为提图斯是罪魁祸首。

无论两位史学家在提图斯的态度上有多大分歧,基本的史实还是清楚的:在这场战争中,耶路撒冷圣殿被罗马人焚烧,近百万犹太人被杀,耶路撒冷城市被夷为平地。在烧毁圣殿之前,罗马人的确慎重考虑是否烧毁这个建筑,并召开军事会议专门讨论,而与参会者在这个问题上的确存在分歧。不同的是两人对于提图斯本人在这个事件中的态度与作用的描写。可以肯定的是,在两种完全不同的表述中,一定有一种与事实是相悖,或者说有一种说法是“谎言”。

确认是否谎言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法:一是通过旁证。塔西佗或约瑟夫斯



可能共同参考过的资料,即约瑟夫斯在他的《自传》(342、358)、《犹太古史》(19:95)和《驳阿皮翁》(1:56)中都提到过的罗马皇帝的军事记事(*Commentaries on Jewish War*),但该记事文献的存在从未得到证实。而他们之后的史学家关于此事的资料来源都不外乎来自这两位史学家中的某一位。二是个人经历。对于古典史学家来说,是否亲历所描述的历史事件是判断真伪的重要标准。就这一点来说,约瑟夫斯似乎更为可信一些。对于这场战争,他并非一个旁观者,而是亲历者和“深度参与者”<sup>①</sup>,而塔西佗当时只是一名15岁的少年。此外,约瑟夫斯在提图斯父子身边都待过一段时间。尤其是罗马军队围攻耶路撒冷期间,他一直担任提图斯的重要随从,不仅仅是翻译,也是提图斯了解敌方、代表罗马人与犹太人沟通的重要人物。但客观地说,他的个人经历一方面使他所陈述的事件具有极大的信息价值;另一方面,由于他在战争中的立场和个人经历,他在对事件的描述上经常有意无意地流露出主观偏见。约瑟夫斯作品中显而易见的偏见以及他与弗拉维王朝的恩主与被庇护者的关系(获得罗马公民权、不菲的年俸、被赠与弗拉维家族旧宅等),让我们不得不怀疑他对提图斯的描写又是一首处心积虑的皇帝赞歌。三是分析作家的写作态度、目的与读者。他说过,自己写《犹太战史》的基本目的是记录这场战争历史,是他书写整个犹太民族历史宏大目标的一部分。他在这部书的序言里就表示,接下来他将写一部犹太民族的古代史。这个目标他在之后用了20年的时间来完成。就这一点来说,约瑟夫斯的确是一位伟大的、严肃的、负责任的历史学家,指责他写《犹太战史》单纯为了吹捧弗拉维王室并不客观。尽管成书之后,他将此书献给维斯巴芎父子,但就当时的情况来看,这样的做法并不少见。罗马同时代的著名史学家老普林尼也是提图斯的朋友,他的整部《自然史》都是献给提图斯的,人们也并没有批评他这样做是为了讨好皇帝。当然,约瑟夫斯在书中对提图斯父子过度的溢美之词也的确容易让人怀疑他的写作动机。

至于《犹太战史》的读者群问题,在我看来,则与约瑟夫斯在圣殿问题上粉饰提图斯的动机更为相关。关于这场战争,约瑟夫斯在他所有著作中,对犹太叛军的态度很清楚、很一致:他认为犹太人造反是非正义的,是少数野心家分裂人民、独裁大众的结果,是叛乱者的残酷和暴力导致犹太民族和圣殿的毁灭。尽管他曾短暂地和叛乱者并肩战斗,但站在亲罗马的犹太上层社会的立场,他对受压迫者和无产者的认同感并不多。据他所说,他的《犹太战史》希腊文版本之前还有一个阿拉米语版,此版本被送往“腹地的少数民族”(1:3)。他在稍后对所指地区

<sup>①</sup> Tessa Rajak, *Josephus: The Historian and His Society*, London, 2002, p. 222.

#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6辑

和人群作了具体描述,他指的是边远地区的帕提亚、巴比伦、阿拉伯、爱迪宾等部落中的犹太人群。其目的是让他们得知事实真相,以免他们重蹈叛乱的覆辙(1:6)。尽管没有明确说明,但我们已经很清楚,阿拉语版本的《犹太战史》写作目的在于警示其他地区的犹太民众不要卷入战争,或者说不要被煽动造反。无论如何,这符合约瑟夫斯本人对战争的看法。对于犹太民众来说,耶路撒冷圣殿就是他们心目中的宗教圣地,在他们眼里,烧毁圣殿无疑罪大恶极。约瑟夫斯深知圣殿在犹太民众心目中的重要性,所以他才在《犹太战史》中借阿格里帕之口,长篇陈述罗马人之强大,抗击罗马人有如以卵击石,绝不能效仿。仅从这个目的出发,他就有足够理由为提图斯开脱焚烧圣殿的责任。约瑟夫斯在此处的“谄媚”也许在提图斯那里讨不到什么好,但对于他的犹太读者来说,是谁烧毁圣殿这一点至关重要。当然我们都知道,约瑟夫斯并没有因此获得犹太人的谅解,而是从此落得“叛徒”和“走狗”的恶名,永世不得翻身。可以想象,对于当时蠢蠢欲动的造反者来说,书中对战争的残酷与血腥的描写一定会使一些人打消继续抵抗的念头。当然,也有不少学者指出,约瑟夫斯描写提图斯在这个问题上的正义,也是为了为自己叛变犹太民族的行为辩护。

正如我在之前的一部专著里评述过,约瑟夫斯是一个写作目的非常明确、情感好恶也表现得很明确的作者。综观他对提图斯整体的正面描写,他完全有可能粉饰提图斯在烧毁圣殿问题上的立场,即他告诉我们的很有可能是一个“谎言”。当代约瑟夫斯研究最重要的学者之一梅森教授(Steve Mason)在他的专著《犹太战争史:公元66~74年》第八章中指出,烧毁耶路撒冷圣殿并不是一个临时的军事行为,而是提图斯摧毁整个朱迪亚犹太政治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观点很有说服力,与塔西佗关于摧毁犹太教必须摧毁其宗教象征的观点一致。前面提到塔西佗对弗拉维王朝也没有特别的情感,尤其是对最后一位皇帝图密善。他还曾抨击过那些阿谀奉承弗拉维王朝的史官。但这并不能说明,他描写提图斯是烧毁圣殿的主使者就是有意诋毁提图斯。事实上,在读《历史》第4卷时,我认为塔西佗对维斯巴芎和提图斯的描写是赞美多于贬低(4:81)。他在烧毁圣殿的问题上与之前对提图斯的描写并不矛盾。他承认提图斯是一位军事天才,在战略战术上展现了果敢、决断、目光远大的特点。正因为他对弗拉维王朝没有特殊情感,没有必要一定要吹捧这位即将成为皇帝的罗马将军,所以他在这个事件的描述上可能更加客观一些。

## 结 论

比较两位历史学家关于第一次犹太战争的描述,塔西佗对犹太民族古代历史的“谎言”,表现了他对犹太文化轻视和不负责任的态度。但这一点并不能说



明塔西佗对历史撰写的轻率,他的观点仅说明了当时罗马帝国大众对犹太历史与宗教普遍的无知与偏见,反映了战争爆发前后,犹太人实力薄弱,在罗马帝国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低下的现实。约瑟夫斯关于犹太古史的阐释则是基于犹太经典文献《希伯来圣经》,具有较高的史实价值和文化价值,但他在关于犹太民族在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部分,有明显的夸张、杜撰与自相矛盾的地方。这个表现是约瑟夫斯作为史学家的民族和宗教立场所决定的,同时再次证实,约瑟夫斯的历史著作,无论古代史或当代史,都没有脱离犹太民族由来已久的圣经阐释传统。

两位作者关于犹太战争前罗马—犹太关系的阐释,对我们研究犹太战争的起因很有价值。两位史学家不约而同地指出,罗马总督个人品质恶劣、执政无能是致使危机升级的重要因素。当然,由于视角与立场不同,从塔西佗的叙述中,我们认识到罗马帝国对犹太宗教和基督教的歧视与厌恶态度,以及有必要对犹太民族进行希腊化文明改造的帝国主义世界观。

约瑟夫斯对战前犹太政治与社会的描述详细清楚,对我们把握今天已经模糊不清的史实特征很有帮助。约瑟夫斯在双边敌对关系升级导致战争爆发的问题上,将更多的责任归咎于犹太宗教狂热分子和叛乱者。在他看来,比起罗马“坏总督”来,使双方关系破灭、犹太民族遭遇灭顶之灾的罪魁祸首是犹太叛乱者。对于犹太叛军的厌恶与批评贯穿约瑟夫斯的整个《犹太战史》。约瑟夫斯对于相关问题的阐释,一方面展示了犹太精英阶层世界观的局限性,另一方面则再次阐释了罪与罚的犹太传统历史观。瑞洁克教授的《史学家约瑟夫斯及其世界》是当今约瑟夫斯研究最有影响的论著之一。和之前的约瑟夫斯研究不同的是,瑞洁克在整个研究中,极力还原约瑟夫斯所处时代与社会的内部结构与阶级冲突。她甚至用了“阶级斗争”和“革命”等理论来解释约瑟夫斯的立场和观点,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关注。按瑞洁克的说法,约瑟夫斯描述叛乱前的种种“坏总督”事件,是作者站在犹太上流社会阶层,对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的阐释。<sup>①</sup>她相信,从约瑟夫斯的阶级立场出发,他关于战前罗马—犹太关系和战争起因的阐释非常可信,对我们把握今天已经模糊不清的史实特征很有帮助。我赞同这种将历史文本放入历史环境中分析的观点,它能使我们摆脱约瑟夫斯“叛徒”“撒谎者”或者“罗马走狗”等标签的纠缠,而把他作为一种时代现象来分析和解读。

对于约瑟夫斯“谎言”最严重的指责,莫过于他关于提图斯在烧毁耶路撒冷圣殿事件上的描写。在这一点上,塔西佗和他的表述差异很大。两位史学家对

<sup>①</sup> Tessa Rajak, *Josephus: The Historian and His Society*, London, 2002, p. 88.

事件结果的描述没有很大的出入——罗马人烧毁了圣殿,但在这个行为的主要负责人问题上,他们的观点则大相径庭。认为约瑟夫斯在这个问题上撒谎的主要原因集中在他的亲罗马立场、他在战争中的变节行为以及他与弗拉维两代皇帝的恩主与被庇护者的关系。对于塔西佗相关问题的叙述,我同意梅森教授的观点,塔西佗在这个问题上缺乏说谎的动机。就政治利益来说,铲除犹太教的中心对罗马的统治有明显的好处。这个观点也符合塔西佗本人对于犹太民族的看法。同时,提图斯支持烧毁圣殿的态度符合塔西佗之前对提图斯办事果断、有远大战略眼光的政治家形象的塑造。但即使我们同意约瑟夫斯在这个问题上没说真话,也不能简单地给他贴上“说谎者”的标签。事实上,这个谎言给予我们的信息大大超越了它本身的分量,或者说,约瑟夫斯在此处的“谎言”也是这场战争史实的一部分。从《犹太战史》的写作目的来看(至少是其阿拉米语版本),这部著作有强烈的政治意图,用于警示耶路撒冷以外地区的犹太人要看罗马人的强大(也许还有神助的正义),不要再度起义。也许提图斯本人对于烧毁圣殿并没有罪恶感(事实也证明,摧毁耶路撒冷城与圣殿一直作为提图斯最辉煌的战功之一),如果单纯吹捧提图斯,约瑟夫斯大可不必为他掩饰。约瑟夫斯的这段描述一方面表现了他要维护提图斯声誉的愿望,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他(以及所有犹太人)心中深切的圣殿创伤。对于当时以及后来许久的犹太民族来说,圣殿的毁灭代表了犹太教中心的彻底毁灭,其中的痛苦与失落难以忘怀。对约瑟夫斯来说,对这段历史的描写必须引入道德裁判,必须符合犹太传统的历史观。关于提图斯这个人物的描写,无论真话假话,都是史学家对于这场战争的道德裁判的一部分。

比较历史上两位重要的史学家关于第一次犹太战争的书写,为我们认识那段历史时期的罗马与犹太的关系提供了更为客观全面的信息。在整个研究过程中,简单判断什么是谎言,什么是真实并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更希望通过对不同史料及来源的研究分析,让我们对历史真实的认知更为立体和丰满,也让我们能够更加客观地、多角度地了解历史,更加客观地看待历史学家、理解他们的叙事立场与态度,从而能够更为接近历史的真实。

## 参考文献

1. Barnes, Timothy David, "The Sack of the Temple in Josephus and Tacitus," *Flavian Rome*, Josephus and Oxford Scholarship Online, September 2007.
2. Bruce, Frederick Fyvie, "Tacitus on Jewish History," *Journal of Semitic Studies*, xxix/1, Spring, 1984.



3. John Curran, "The Jewish War: Some Neglected Regional Factors," *Classical World*, Vol. 101, No. 1, Fall 2007.
4. Roland Deines, *Acts of God in History: Studies Towards Recovering a Theological Historiography*, Christoph Ochs & Peter Watts (eds.), Tübingen: Mohr Siebeck, 2013.
5. William Den Hollander, *Josephus, the Emperors, and the City of Rome: From Hostage to historian*, Leiden: Brill, Leiden, 2014.
6. Joseu, "Josephus, and the fall of Jerusalem: On Doing History with Scripture," *Theological Studies*, 71(1), 2015.
7. Sean Freyne, The Revolution from a Regional Perspective, *The First Jewish Revolt*, London, 2002.
8. Steve Mason, *A History of the Jewish War, AD 66-74*,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9. Jonathan Price, *Jerusalem under Siege*, Leiden, 1992.
10. Tessa Rajak, *Josephus: The Historian and His Society* (2<sup>nd</sup> ed.), London, 2002.
11. "Josephus in the Diaspora," *Flavius Josephus and Flavian Rome*, Edmondson, Jonathan & Mason, Steve (eds.), Oxford: OUP, 2005.
12. Zvi Yavetz, "Reflections on Titus and Josephus," *GRBS*, 16(1975).
13. Victor Tcherikover, "Jewish Apologic Literature Reconsidered," *EOS*, 48.
14. 周平:《〈犹太古史〉所罗门传:希伯来传统与希腊化双重视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年版。